化蝶之境

——在比较文化视域下重读《梁祝》以及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 邱瑾

**论文提要**：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梁祝》的故事影响深远。很多中西比较文化学者常将之与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做对比，在强调“反封建”主题的同时，往往对该故事做出一些负面解读。究其原因是忽视了文化语义语境（interpretive context），不自觉地在用带有“一多二元”色彩的西方话语框架来阐释“中国故事”，忽略了《梁祝》的进步和积极意义。本文将试图在比较文化视域下重读该故事，用“一多不分”的宇宙观来解读《梁祝》，并借以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问题。

**关键词**：梁祝 一多不分 一多二元 比较文化 中国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的故事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朱》）则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作。这两部爱情悲剧经典虽然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不同，讲述的都是关于青年男女相爱却遭到社会和家庭的重重阻挠、以致最后双双殉情的故事。两者之异同吸引了很多中西比较文化学者的关注。

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比较研究中多强调两个故事的“反封建”主题要素。然而虽然都以主人公殉情身亡为结局，《罗朱》往往被视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旧制之斗争的胜利，而《梁祝》则代表着反抗封建伦理的失败。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梁祝的死已成为对代表封建思想和社会传统背道而驰的人民大众同整个具有根深蒂固封建意识、也就是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礼教的统治集团的较量，并且以人民大众的失败为结局，是一种社会的悲剧。”[[1]](#footnote-1)研究中还不难看到这样的对比：“一个（指《梁祝》）是被动消极地反抗，一个（指《罗朱》）是积极努力地争取”[[2]](#footnote-2)。“《梁》中的男女主人公处处遵循伦理道德的规范, 呈现出沉重的伦理色彩, 而《罗》中的男女主人公则不受任何外力的束缚, 勇敢追求个人价值, 呈现出张扬的个性色彩。”[[3]](#footnote-3)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将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分别以“消极”“沉重”和“积极”“张扬”加以描述，暗含着抑此扬彼的态度。研究者原本试图去揭示故事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却忽视了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宇宙观，结果要么贴附标签，要么落入西方话语框架，对《梁祝》做出了一些误读。本文将试图在比较文化视域下重读该故事，用“一多不分”的宇宙观来解读《梁祝》，并借以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问题。

一、“反封建”：实质还是标签？

重读《梁祝》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它是否是一个“反封建”的故事？E. 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提出: “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4]](#footnote-4)如果我们追溯《梁祝》文化的传统，会发现“反封建”并非故事内在的本质特征，更多是一种被后人赋予的“标签”。

《梁祝》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自西晋始，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据不完全统计，该故事的唱本、传说及不同版本有500多种，可见样式之丰富和流传之广。从南北朝《华山畿》乐府到明清时期的《梁山伯宝卷》及传奇《访友记》、《同窗记》等都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这一故事。据钱南扬先生的整理和推想，梁祝故事最初的情节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女子乔装成男子，到学堂里去念书，后来爱上了一个男同学，却又不肯说出自己是个女子。父母不知就里，将她另许了人。及到男同学知道她是个女子，要想订婚，可已经迟了。结果，两人郁郁而死。”[[5]](#footnote-5)可见《梁祝》故事的雏形实际上是民间流传的一个有关女扮男装接受教育的故事。

也许因为情节过于简单平常，才逐渐有了后人的各种增饰附会。如由“韩凭妻裙化蝶”演变而来的“化蝶”情节。冯梦龙在所编《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就设计了梁祝合冢、化为飞舞彩蝶的情节，“忽然一声响亮，地下裂开丈余，英台从裂中跳下。众人扯其衣服，如蝉脱一般，其衣片片而飞。再看那飞的衣服碎片，变成两般花蝴蝶，传说是二人精灵所化，红者为梁山伯，黑者为祝英台。其种到处有之，至今犹呼其名为梁山伯、祝英台也。”清代邵全彪的《祝英台小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哭，地忽开裂，堕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

将《梁祝》与“封建”挂上钩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王亚平在《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文中指出了梁祝“是封建婚姻的一幕大悲剧”[[6]](#footnote-6)。其后，何其芳在《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文中，揭示了梁祝故事的意义是“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并提示了梁祝故事本身的斗争性与反抗性。[[7]](#footnote-7)根据范瑞娟回忆，1951年春她当时参加的越剧剧团对《梁祝》进行了改编，定下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剧本，鲜明地突出了全剧反封建的主题思想。[[8]](#footnote-8)随后，有关梁祝的论著中就开始大量地出现反抗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反抗封建礼教、反抗封建势力、反抗封建制度、反抗封建社会等等语句，突出了梁祝故事的反封建意图。

对此，周静书在《百年梁祝文化发展与研究》中勾勒出这样一种政治性意图的背景: 一是建国初提倡的“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半年后颁布的新婚姻法，一是建国初党和政府对于文化遗产、文艺、戏曲的一系列政策方针。[[9]](#footnote-9)《梁祝》的越剧与川剧的改编也揭示了在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背景下确定“反封建”主题的事实。[[10]](#footnote-10)“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政治意识，一时间成为一个定论和一种价值观，是评价所有与梁祝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11]](#footnote-11)由此可见，《梁祝》的“反封建”意义并非历来就有，而是经过历史建构的，更多是在建国后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主要来自于文艺界人士的一种政治性的诠释。

二、“一多不分”vs“一多二元”

如果我们揭去了《梁祝》的“反封建”标签，再来以“一多不分”的哲学观来重新读解这个传说，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意义，尤其是将之与代表“一多二元”观念的《罗朱》进行对比时。

关于“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涵义，田辰山曾做出精辟的阐释：“我们所说的‘一多不分’，是指一切事物无不存在于互为联系之中，无一物是独立、单子个体，万物因相系不分而呈现出浑然而一的状态；而‘一多二元’，是指一切独立、单子个体之间因为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12]](#footnote-12)如果说《罗朱》基于一种强调对立性、割裂性、分离性、冲突性的二元论，那么《梁祝》所蕴含的是以互系性和连续性为特征的“一多不分”世界观。

1 *伦理关系中的爱情*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为十四世纪意大利的民间传说，讲两家互为世仇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于舞会中相恋，但不被家族所容许。朱丽叶的父亲更强迫女儿嫁给别人。《罗朱》从故事开始就充满了人物的对抗以及激烈的心理冲突。罗密欧宁愿抛弃家族姓氏，坚定地去爱一个仇家的女儿；朱丽叶面对父母的逼婚则愤起抗争，誓死不从。为了与爱人相守，朱丽叶服下假死药伪装死亡以求私奔，但罗密欧却以为爱人身亡而自尽。从深眠中醒来的朱丽叶悲痛万分，最终在爱人的遗体旁殉情。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个体性”理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具有深厚的根源。个人主义者以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为己任，认为这是生活的终极目的，是人之自然本性的需求。这种个人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追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 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认为人是世界万物中最为重要的，强烈追求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要求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家族利益之上。《罗朱》的主人公为了爱情可以做一切事情，放弃一切事情，包括家族姓氏甚至生命。当爱情和家族声誉、社会道德标准冲突时，他们总是选择前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地位及个人尊严至高无上，绝对不为其他外界因素所左右。《罗朱》中的人物呈个体性、分散性、孤立性、相互对抗性的存在。

不同于《罗朱》，《梁祝》讲述的不是个体的爱情，而是伦理关系中的爱情。故事里没有如《罗朱》般孤绝激烈的抗争；人与人的关系是含蓄而又紧密，绵长而又深厚的。与罗朱如闪电流星般的相遇相爱经历不同，梁祝的感情是在同窗三载、频繁接触、相互了解、志同道合的基础上慢慢建立的一种纯真持久的爱情，从相知到相爱，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祝英台爱上梁山伯后虽“日则同食，夜则同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十八相送中英台的感情是含而不露、欲说还休。两人的关系“发乎情，止乎于礼”。较于西方爱情奔放的不同，梁祝的爱情最扣人心弦的就在于它热烈而有节制，激动而不粗暴，失望中蕴含着希望。

即使为了追求爱情，英台与父母也并没有公然决裂。按照钱南扬先生的推想，最初的故事里父母只是“不明就里”将她许配于人，连后来一些戏曲版本中逼婚的情节都没有。英台还拜托师母，让梁山伯去提亲；后来又听从父母之言，嫁给马家。这些行为选择与其解释为人物被礼教所束缚，不如说表现了人物的伦理意识，对家庭、人伦关系的重视。《梁祝》中“自我”的角色表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礼”是人的角色及社会关系的恰宜状态。英台的“个性”和“自我”也表现在她所扮演的重重角色中，不仅是相对于山伯而言的恋人，也是她父母亲的女儿，师父师母的学生。“在儒家思想这里，人不是个体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意义的分离无关性，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生活的多样角色，它是构成人作为人的东西。”[[13]](#footnote-13)个人的重要性来自多方面的、不断生成、不断演变的关系，不是诉诸独立性本质，而是由人的身分角色和关系体现的黏附性。梁祝在爱情中需要考虑的不单是满足“个人”欲望，而是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来“成仁”。

《梁祝》与《罗朱》相比，除了“化蝶”这一高潮，其他部分无论是情节的表达方式还是情感基调，都没有突出的冲突，始终给人一种涓涓细流的舒心。与西方人不同，中华文化不以“一己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平等”、“自主”、“人权”）为价值，而是以活生生的、攸关生命的关系为价值。彼此、适当、适中、适度才是中华文化所珍惜的价值。

2*女扮男装的积极意义*

人物性格上，《罗朱》的主人公敢爱敢恨，热情奔放，极为强调自我、自由，第一次在舞会上偶遇时男女主人公就一见钟情，而且丝毫不掩饰内心对对方的好感，没过多久就投入了彼此怀抱。家族的深仇大恨阻挡不了爱情的狂潮，反而使爱情之火越燃越旺。

相比之下，《梁祝》的主人公就含蓄的多。不少学者在对比《罗朱》和《梁祝》时经常表现出贬低后者的倾向：“于这种文化特性相应而生的中国人格就普遍缺乏自主意志和个人生命自觉意识，总是不自觉地依附于社会伦理，并把它作为行为的规范。而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共性又总是压抑个性，祝英台就是被这种伦理文化磨掉了几乎所有的棱角。”[[14]](#footnote-14)“罗朱两个热情大胆，勇往直前，没有顾虑，没有迟疑和动摇，紧紧追随自己的自然本性，毫不迁就，个性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梁祝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缩在社会伦理的阴影里，更象是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先人的干巴巴的道德标本，他们个性的亮点、实如沧海一粟，毫不引人注目。”[[15]](#footnote-15)

这样的解读看似有理，实则错谬，因其恰恰忽视了文化语义语境（interpretive context），不自觉地在用“自主意志”、“个人生命自觉意识”、“自然本性”等带有“一多二元”色彩的西方话语框架来阐释“中国故事”，忽略了《梁祝》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忽略了主人公真正的“亮点”。如安乐哲在《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中讨论中国性别歧视观时所提到的，当今一些研究误区是“移植当代西方模式、语言、以及事实标准来评价中国人的经验”， “这类研究具有一种未表明的假设，似乎任何中国固有的关于个人完善的标准，无论男人的还是女人的，那种建立在关联关系、相互依存、等级角色、以及互补与差异等概念语言上的标准都失去了意义；而唯一其作用的，评价个人实现的标准只能是自律、独立、平等及自由等。而这些标准大体来自于自由民主工业化的西方白人世界的基本信念。”[[16]](#footnote-16)

在人物性格上，《梁祝》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兼有传统“男性”和“女性”的性格特质。尤其是祝英台的人物塑造，打破了二元论的男女对立，其“女扮男装”就是一个非常带有隐喻意义的情节要素。就中国的性别概念问题，安乐哲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观点：“中国的性别概念特点是，在女性也给予追求人性完善和自由的情况下，她也可以通过在同样的，即男性因为标准的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范围内寻求和谐，从而达到人性完善的目的”[[17]](#footnote-17)。从这一点来说，就赋予而非剥夺女性成为完善的人的可能性这一点来说，《梁祝》的进步积极意义是相当显著的。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及传说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女扮男装”的传奇故事：花木兰代父从军，黄崇嘏赋诗辞婚，韩氏女驰骋疆场，孟丽君夺魁科场等佳话广为流传。这些巾帼豪杰打破了“男女有别”的模式而展现出女性不亚于男性的智识和勇气。而值得注意的是，《梁祝》的原型是一个受教育的故事。除了爱情主线，也是一个关于儒家文化中“学以成人”的故事。英台出身有钱人家，她反抗传统社会对女子的不平等待遇和束缚，争取与男孩子一样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在书院读书的几年她没有被人识破，说明在智识上与男同学并无差别。在爱情方面，她敢于挑战长久以来“门当户对”的观念，与平民子弟梁山伯相恋，为自己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一方面她具有不畏强权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勇气，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内心世界，一方面又顾及伦理孝道，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事原则，不仅拥有读书人的知书达礼，更不失传统中国女子的温柔婉约，最后一跃却又表现了“刚强、刚烈”的一面。可以说，英台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女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人”的代表——既勇敢坚强，也柔顺忍耐。性格中既有“刚”的一面，又有“柔”的一面，并且刚柔相济，和谐统一。这个具有雌雄同体性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梁祝》故事中最耀目的“亮点”之一。

3*“一多不分”的美好结局*

虽然都是殉情，但《梁祝》和《罗朱》的结局分别塑造了迥然不同的意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亡阴森恐怖，冰冷的墓穴中躺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淋漓的鲜血染红了落幕的布帷。死亡是沉重的，令观众感到悲痛和恐惧。

《梁祝》的结局则以虚幻的方式回避了血腥与恐怖。“彩虹万里百花开，花间蝴蝶成双对，千年万代不分开，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雨雷电大作之后，风停雨霁、彩虹高悬，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化为两只翩翩飞舞的蝴蝶穿梭于万花丛中。梁祝的爱情从“决然赴死”到升华为“死后方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源头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 齐物论》）。庄子正是借蝴蝶这一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万物皆一”的宇宙观和“物我两忘”的人生追求。此后，“蝶梦”成为历代文人心灵的慰藉：或借蝶梦抒发悲欢离合——“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或用蝴蝶渲染恬静自在的美好氛围——“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曲江》）；或借蝶梦表达无拘无束的情怀——“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或借蝶寄言有情人永结同心——“八月蝴蝶来，双双西园草”（李白《长干行》），“复此从凤蝶，双双花上飞。寄语相知者，同心终莫违”（萧纲《咏蛱蝶》），“山上桃花红似火，双双蝴蝶又飞来”（史承豫《荆南竹枝词·咏梁祝）。

蝴蝶是自然的精灵，梦蝶蕴含着物我的交合与转化，包含了浪漫的情怀和深刻的哲思。蝴蝶是灵魂的象征，代表着梦幻，是生命与复活的象征。化蝶的情节也发生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大概因为蚕蛹“破茧成蝶”，获得身心的双重自由，昭示新生命的开始。同时，双飞蝶又可做恩爱夫妻的象征。梁祝肉身虽死，但灵魂可以永远双宿双飞，甚至意味着复活的可能，得到永生。相比《罗朱》通过肉身毁灭而突出的悲剧意识，梁祝化蝶具有优美崇高的意境，不仅表达了对“死生挈阔”的美好爱情的向往，也表示出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三、讲好中国故事

2006年，“梁祝传说”登录“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和元素——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案例。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如何讲好《梁祝》以及其他“中国故事”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当今《梁祝》世界性的传播形式是多样的。除了话本，主要是以电影、音乐、戏曲、花样滑冰等形式。今年恰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辰60周年。然而，尽管《梁祝》协奏曲至今有俞丽拿、盛中国、吕思清、西崎崇子……等不下十几个版本，但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依然有限。2006年在日本长野县举行的 NHK杯国际花样滑冰竞技大会上，我国健将张丹和张昊演绎的《梁祝》获得男女双人滑亚军。表演虽然惊艳，但从日本网民的反应看, 很多人只了解这是一个在现世悲恋的男女化成蝴蝶长相厮守的故事, 并不知道背景音乐源自何方以及涵义何在。[[18]](#footnote-18)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不光西方人对《梁祝》的了解有限，连我们自己都可能误读或淡忘。关于梁祝传说的传承现状，有一份调查资料表明，“能够完整讲述梁祝传说的人已不多，尤其是年轻人对梁祝传说已经很淡漠”，并认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梁祝传说目前面临濒危的情况”[[19]](#footnote-19)。个中原因值得深究。一定程度上，用西方话语来解读《梁祝》、将其简化为反抗封建礼教的符号也无形中加大了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的隔膜。

梁祝的故事在世界范围传播，爱情和悲剧是两个关键词。爱情是一个世界性的永恒主题, 而故事悲剧性的共鸣也是人类都具备的情感。中国的传说要被国外所接受, 离不开这样的永恒的主题和共鸣的情感。使梁祝传说首次成功地走向世界舞台的正是周恩来总理。1954年 5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带去了包括电影《梁祝》在内的一些艺术作品。在邀请各国代表和记者观看这部电影时，他提议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句介绍语。把梁祝故事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采用了中西互鉴的阐释话语，建立一个比较文化的视野或语境，这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

更进一步，我们要用“一多不分”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不能用西方的思想观念、理论构架、话语法则来扭曲中国故事。例如，在讲《梁祝》这个故事时，如果一味强调个性、自由、人权，那必然导致对主人公和主题得出负面结论，无法把握故事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把它放在“以关系为本”、“以道为本”的语境中，便能还原故事的本来内涵，才能领略《梁祝》关乎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崇尚“中和”的宇宙观，也才能欣赏梁祝“发乎情止乎礼”的具有中国文化节制和含蓄特色的爱情美学。据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在看完了《梁祝》电影之后惊讶对周恩来说：“中国的伦理道德太独特了，与欧洲根本不同———看见自己思慕的情人，竟不亲吻，不拥抱，甚至手都不握。”再看下去，莫洛托夫又诙谐地说道：“中国男女就是这样冷冰冰的，到病倒、到死都不表现自己的爱！我们的青年到了那里非犯错误不可。”[[20]](#footnote-20)这样貌似“冷冰冰”实则深厚绵长的爱情正是像《梁祝》这样的中国爱情故事的动人之处。

此外，讲《梁祝》故事不应一味贴上“反封建”标签，或将人物纯粹看作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应表现其所弘扬的儒家文化的理想、所追求的“中和之美”的风格特征，尤其是体现在祝英台这个刚柔并济、类似雌雄同体的人物身上的古代中国反性别歧视方面的积极进步的因素。要认识到，在爱情主线下《梁祝》还有一条“学以成人”的暗线，一个女性脱离性别的桎梏而试图通过教育和修养达到人性的完善，通过不断追求自身在社会关系的最恰宜性来“成人”或“为仁”。这是多么值得挖掘的主题！

《梁祝》故事要想讲的精彩，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点睛之笔，那就是对“化蝶”结局的表现和阐释。不是如同《变形记》中人物到动物的形体蜕变和堕落，而是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交融，是生命的升华和永恒，寄托了幸福和希望，表现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世界观的内涵本质。

结论

由此可见，“一多不分”是讲述和传播《梁祝》故事的关键词。“中国特点的好故事，都是‘一多不分’的故事，都必须是‘一多不分’结构话语的叙事。”[[21]](#footnote-21)从《梁祝》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受到启示：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思维，要跳出以一多二元为主导的西方话语框架，而回到正确的语义语境，对传统文化建立合理的判断和评估，从而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建立文化自信，真正地理解和步入“化蝶之境”，用“一多不分”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邱老师：你的论文把我看哭了好几次。被梁祝感动了，被您用一多不分观讲述的梁祝改动了。写的太好了。很佩服您的学习精神、领会能力和学以致用能力。我们多联系，共同研究如何用一多不分讲述中国和中国文化。谢谢您的精彩之作！我们准备推荐发表。

（字数：8928）

1. 何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对比研究[J].科技风,2012(07):204. [↑](#footnote-ref-1)
2. 吴彩琴.中西方文化对比浅探——以《梁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32(03):79-80. 80. [↑](#footnote-ref-2)
3. 魏金龙.《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差异及其根源[J]作家杂志. 2008 No.2.78. [↑](#footnote-ref-3)
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顾杭 ·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 2004.第 1-17页. [↑](#footnote-ref-4)
5. 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民俗周刊》1930年第 93、94、95期合刊(祝英台故事专号) ( 转引自: 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 术论文卷》中华书局 1999年版,第 1 -6页) [↑](#footnote-ref-5)
6. 王亚平.《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 1950年版(转引自: 周静书主编, 《梁祝文化大观 ·学术论文卷》,中 华书局 1999年版) [↑](#footnote-ref-6)
7. 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人民日报》( “人民文艺”1951年第 92期 ) (转引自: 周静书主编, 《梁祝文化大观· 学术论文 卷》中华书局 1999年版,第 39 -50页) [↑](#footnote-ref-7)
8. 范瑞娟.《我演梁山伯》《戏剧报》( 现为《中国戏剧》) 1961年第 Z 5期. [↑](#footnote-ref-8)
9. 周静书.《百年梁祝文化发展与研究》《浙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0年第 3期. [↑](#footnote-ref-9)
10. 张炼红《从民间性到“人民性”: 戏曲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 》周静书主编, 《梁祝文库 ·理论研究卷》,中华书局 2007年版,453-467. [↑](#footnote-ref-10)
11. 陈志勤.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0(01):24-33. 27 [↑](#footnote-ref-11)
12. 田辰山.用“一多不分”话语,讲“一多不分”故事[J].党的文献,2016(04):64-66.p.64. [↑](#footnote-ref-12)
13.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挑战个人主义意识形态[J].孔子研究,2014(01):7-9.p.8. [↑](#footnote-ref-13)
14. 魏金龙.《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差异及其根源[J]作家杂志. 2008 No.2.78. [↑](#footnote-ref-14)
15. 程英.壮丽的太阳与秀美的月亮——试析《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差异及其文化成因[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01):33-38. 33 [↑](#footnote-ref-15)
16. 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53, 257. [↑](#footnote-ref-16)
17. 同上，263. [↑](#footnote-ref-17)
18. 陈志勤.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0(01):24-33. 32 [↑](#footnote-ref-18)
19. 同上. 30 [↑](#footnote-ref-19)
20. 张丽珍,杨晓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族性——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谈[J].科技信息,2009(26):302-303. P. 303 [↑](#footnote-ref-20)
21. 卞俊峰编，《豁然：一多不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24-25 [↑](#footnote-ref-21)